

格致人文读本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

[英] 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 / 主编 张小勇 李贯峰 / 译

CAMBRIDGE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

[英] 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 / 主编 张小勇 李贯峰 /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英)斯金纳
(Skinner, Q.)主编;张小勇,李贯峰译.—上海:格
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格致人文读本)

ISBN 978-7-5432-2620-3

I. ①人… II. ①斯… ②张… ③李… III. ①人文科
学-思想史-世界 IV. ①C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5132 号

责任编辑 顾悦
装帧设计 路静

格致人文读本

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

[英]昆廷·斯金纳 主编
张小勇 李贯峰 译

出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186,000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620-3/C·147

定价:35.00 元

编辑的话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解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解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对“人文”的关注和反思，无论中外和古今，是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话题。然而 20 世纪以来，人类往往因掌握了引领时代发展的科学技术而沾沾自喜，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同时，精神活动空间却日趋褊狭。反映在学科教育上，即教育趋向职业化、工具化，无法传递人文关怀、人性之美。耶鲁大学教授安东尼·T.科隆曼(Anthony T.Kronman)认为，人文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阅读伟大的文学和哲学作品而去“探究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重提人文学科，再次发掘人文学科的魅力和价值，目的也就在于为久浸于科技文明喧嚣的读者，营造一方“解人文，思自我，通古今，知天下”的精神家园。

当今的人文学科，超出了传统意义上文史哲的范畴，涵盖了艺术学、教育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各个专业。学者对人文学科旨趣、致思方向和思维方式的探讨，使得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更加宏大，研究对象愈发复杂，研究方法日趋多样。近年来人文科学的发展，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方便读者便捷、有效地了解古今中外杰出的研究成果，我们遴选了 20 世纪以来人文研究领域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经典著作，汇集为“格致人文读本”，其内容涵盖了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和各领域的具体研究，且每一种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普通的专业教科书，兼具可读性和学术性。

“心理东西本自同，文明新旧总相宜。”我们希望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为契机，为

广大高等院校师生和爱好中西文化的社会大众,提供开拓视野的路径、思考与批判的平台、点染启迪心灵的气韵,进而在整个社会,尤其在高校中培育深厚的人文精神滋养。

前言

作为本书的编者,我首先要感谢的是 BBC Radio 3 谈话节目的迈克尔·梅森 (Michael Mason)。我正是与梅森先生首次谈到这个想法,即就最近人文科学领域的理论发展约组一批论文。其结果就是本书以下八个章节初次成形,作为梅森先生围绕该一般主题于 1984 年春季为 Radio 3 制作的系列谈话的内容。该系列谈话以“宏大理论的回归”为题播出,随后在《听众》(*The Listener*)^①中刊出。我深深感激梅森先生,他说服 BBC 开展这一系列谈话,敦促我与撰稿人联系,并且在所涵盖的话题范围上,以及在展现我们论点的最佳方式上,为我们参与本系列广播的所有作者提供专家指点,使我们受益良多。

我也非常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杰雷米·米诺特(Jeremy Mynott),正是由于他的指导和鼓励,广播谈话现在才得以成书。基于他的建议,原始讲稿全部进行修订并大大扩充,增加了参考书目和深入阅读指南,并且约组了另外两章:一章是戴维·霍伊(David Hoy)关于德里达的,另一章是詹姆斯·布恩(James Boon)关于列维-施特劳斯的。乔纳森·辛克莱-威尔逊(Jonathan Sinclair-Wilson)在本书付诸印刷的过程中负责编辑工作,并且是以他那一贯的冷静和高效完成了这项工作。彭尼·苏斯特(Penny Souster)作为副编辑,仔细地清理解决了最后一刻的诸多困难。

① *The Listener* 是 BBC 于 1929 年由洛德·里恩(Lord Reith)创建的一份周刊,1991 年停止刊行。——译者注

viii 我也愿对所有那些对本书有所贡献的人表达我的谢意。他们在每个阶段都帮助过我,不仅在新闻报道上给我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而且一直都心情愉快、任劳任怨地按期完成各自的任務。最后,在撰写和修订我的导论的过程中,我也欠下了无数情意。因为有若干读者就原始广播致信给《听众》,我希望我已经设法照顾到他们的批评。特别是要感谢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苏珊·詹姆斯(Susan James),他们二人都一丝不苟地对导论的系列草稿给出指正,而且还在本书的整个出版过程中提供了无数不可或缺的支持和意见。

我还利用了早前再版的机会修改了一些细小错误。我也要感谢最初的诸位撰稿人指出了这些错误,特别是基斯·托马斯(Keith Thomas),感谢他的格外小心。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导论：宏大理论的回归 昆廷·斯金纳 / 1

第二章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威廉·乌思怀特 / 16

第三章 雅克·德里达 戴维·霍伊 / 31

第四章 米歇尔·福柯 马克·菲利普 / 49

第五章 托马斯·库恩 巴里·巴恩斯 / 61

第六章 约翰·罗尔斯 艾伦·瑞安 / 74

第七章 尤尔根·哈贝马斯 安东尼·吉登斯 / 89

第八章 路易·阿尔都塞 苏珊·詹姆斯 / 103

第九章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 詹姆斯·布恩 / 116

第十章 法国年鉴学派 斯图尔特·克拉克 / 131

参考文献 / 148

人名索引 / 161

译后记 / 164

第一章 导论:宏大理论的回归

昆廷·斯金纳

几乎整整 25 年前,美国社会学家 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撰述英语 3
世界中人文科学的状况时,分离出两种主要理论传统并对之加以斥责,认为它们与
他的一本书的标题所描述的“社会学想象”^[1]的有效进展势不两立。第一种倾向是
企图如此来操纵历史证据,以便制造出一种“跨历史的紧身衣”(Mills, 1959:22),他
将这种倾向特别与孔德和马克思、斯宾塞和韦伯的哲学联系起来。但是另外一种
倾向对人文科学进程的阻碍还要大,他冠之以“宏大理论”。这是指一种学术信仰,
即社会学说的首要目标是寻求构建“一种关于‘人与社会的本性’的系统理论”
(1959:23)。

米尔斯攻击“宏大理论”的自负主张与其同时代的社会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是以想象之名而非科学之名。^[2]但他对构建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的抽象理论和
规范理论的敌意,却是当时英语世界里不仅包括社会学,而且包括所有人文科学
的主要实践者的共同态度,例如历史学家之中就有许多同样的不信任与之共鸣。颇
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我所谈及的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英国历史学家公推刘易斯·
纳米尔(Sir Lewis Namier)。因为纳米尔不仅充分满意于记载当时政治权力中心的
政治人物个体的详细策略措施,而且也挖苦批评下述信念(或者瞎扯,他更愿意如
此称谓它们),即相信有什么一般社会理论竟然能对政治行为或者社会变革进程的

解释有什么意义(Namier, 1930:147; Namier, 1955:3—4)。

- 我们还在同时代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家中遇到了类似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当时获得了广泛支持。它可以用两个相互关联的主张来表达。其中一个主张可以引用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一个著名标题来表述:“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来到(Bell, 1960)。企图制定一般的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其结果无非是被看做一个混乱而过时的失败,跟不上科学时代。与此相关的是一条正面律令:放弃对过去的宏大哲学体系的研究,以及他们那描述成分与评价成分的无能混合,以便能够继续执行那真正科学的和据称价值中立的任务,即构建后来被称为关于社会行为 and 发展的“经验理论”^[3]。所有这一切就造成了这种印象,好像 2000 年来对社会世界的哲学思考转瞬之间已经走到了尽头。^[4]

走向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这种动力反过来又受到后来大行其道的下述观点的鼓励,即关于哲学和其他文化学科之间的正确关系。那时人们认为一个哲学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基本关切就是解释一般概念,解释的方式无非是分析借以表达一般概念的术语的意义。这项任务的暗示之一就是,假定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真正职责竟然能够给我们提供对特定观念或实践的合理辩护,那只不过是一个错误。举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另外两部代表性著作为例,他们认为研究的目标不是道德本身,而仅仅是“道德的语言”(见于黑尔[R.M.Hare]的标题);不是政治本身,而仅仅是(Hare, 1952; Weldon, 1953)“政治的词汇”(见于韦尔登[T.D.Weldon]的标题)。既然哲学家们自己宣称,关于时代的重大的道德主题和政治主题,他们没有任何系统的东西告诉我们,那么纯粹经验的社会科学的迅速成长似乎就确然无疑。

- 同时代的一些主导哲学学说甚至教义,也给这样的科学抱负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在科学哲学领域内,对于什么构成一个解释的实证主义描述占据了相当大的支配地位。人们认为,要解释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实,无非是说明,这些事实的发生可以通过一种已知的自然法则,或者至少是统计法则推演出来,并且因此可以预测。^[5]此种分析的威力不仅在于它指引着社会科学家,使他们期望规则性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基础,而且,它也要求他们相信,原则上没有什么理由证明,人类行为不应该以与自然事件相同的方式来观察和解释。^[6]其结果就是,“作为科学主题的人”——引用艾耶尔(A.J.Ayer)的著名文章的标题来说——就逐渐成了诸种社会学科不仅可能而且唯一可敬的要求(Ayer, 1967:6—24)。

最后,关于社会科学的这种观念找到了特定的方向,同时也受到了下述事实的

普遍鼓励：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描述的关于科学实践本身的“理性主义的”假设(见本书第五章)得到了广泛赞同。在采取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立场的科学哲学家中间,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及其为数众多的门徒对诸种社会学科地开展施加的影响最为有力。波普尔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提出了什么才能算作科学上真正值得尊重的信念,并且让这种特别的观点流行起来。波普尔坚信,当且仅当一条信念诉诸设计好的“决定性试验”(crucial experiment)来证伪,并且成功通过该项测试的时候,该信念才是具有合理基础的,因而在科学上也是值得尊重的。如果一条陈述——或者一套理论中的陈述群——不能通过可证伪性测试,或者证明根本不能提交测试,那就向我们清楚表明,所说的东西毫无意义(Popper, 1959: 78—92)。有了这条意见,诸种社会学科就发现自己现在有了一种现成便捷的方法,来把所谓根据事实的主张与纯粹规范的或形而上学的主张区分开来,并且因而将自身引到一条笔直而狭窄的、通向真正科学的道路上来。波普尔自己通过他就“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辩论,带着充满激情的确信,极力鼓吹道,在人文科学领域,受到推崇的只是零打碎敲的经验主义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以及一切形式的乌托邦社会哲学,都被一股脑地抛弃到历史的垃圾箱里了(Popper, 1945: II, 212—280)。

时代当然已经变了。就在上一代人那里,乌托邦社会哲学再次重操旧业,同样受到鼓吹;马克思主义复活了,并且以几乎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形式繁荣起来;由于拉康(Lacan)及其追随者的工作,精神分析学获得了新的理论方向;哈贝马斯(Habermas)及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其他成员对马克思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相似之处进行了持续反思;女权运动也增加了一揽子先前受忽略的洞见和论6题;在这整个混乱漩涡中,英语世界社会哲学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城堡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战和侵蚀,包括诠释学者、结构主义者、后经验主义者、解构主义者以及其他入侵部落。

直到如今,随着这场战争尘埃落定,梳理盘查的工作也就可能了,而这正是我们在本书中力图要做的事情。本书的中心落在许多独特的思想家身上。我们相信,在促成这些理论忠实对象的转变上,正是他们在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过去的1/4世纪里,这种巨变和转化已经推动了人文科学的重构。^[7]故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努力将他们置于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之中,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阐明这种剧变和转化的更加一般的特征。

二

在这些广泛的变革当中,可能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对那个假定的普遍反对,即各部门自然科学为各种社会学科提供了适当的,或者甚至是实质的模型。关于这种日渐增长的疑虑最明确的反思,当属下述意见的再次流行: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与对自然事件的解释,在逻辑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因此,实证主义者认为一切成功的解释都必须遵循相同的演绎模型,这个论点必定从根本上就是误解。这种呼声转而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升为寻求发展一种人文科学的诠释学方法,该方法能够公正对待下述要求:对人类行动的解释必须总是包括从执行社会行为的行动者的角度,来努力恢复和解释那些行动的意义,或许甚至本身就要采取这种形式。

最近,有些社会理论家已经在寻求调和这两种传统(大多沿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精神),他们主张,一套完满的社会解释理论,必须同时考虑社会现象的意义和原因。^[8]但是其他人却拒绝了这样一种调和立场的可能性,相反,他们重提更早的作家,如狄尔泰(Dilthey)和柯林伍德(Collingwood)的那条远为激进的意见,即我们应该用纯粹解释性的术语,来看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任务。^[9]对这些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就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晚期哲学,因为他的坚定的反实证主义观点认为,话语的意义不过是它的运用,由此,对任何有意义的片段的理解(无论是一次行动还是一个话语),总是迫使我们把它放置在它的确切的“生活形式”中。^[10]不过,对人文科学实践具有更直接重要性的当属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对类似观点的采用。这正是本书第二章的主题。伽达默尔在他的主要著作《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一书中,部分汲取了狄尔泰,但首先是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元素,他在那里谈论道,在寻求理解一项社会行动的过程中所需要借助的唯一正确的模型,不过是解释文本的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我们丝毫不关心对原因的研究,或者对法则制定的研究,而是一心一意地投入到一个循环理解过程当中,即努力从整体的各个部分来理解整体,又从各个部分对整体意义的作用来理解部分(Gadamer, 1975a)。

然而,伽达默尔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同时注入了新的怀疑主义元素。他强调,我们自己的视域都有局限,我们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偏见和成见,从而影响了我们对另外一种生活形式的理解。伽达默尔就此怀疑,我们是否有望达成传统

的解释目标,即用其本身的术语来“客观地”把握一项外在行动、话语或文本。他的结论是,我们永远不能指望将自己从我们的当前世界分离开来,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多只是一种“视域融合”,即在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试图评价的不同世界之间的部分和解(Gadamer, 1975a:267—274)。

从这些怀疑可以轻易跨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结论: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把解释看作获取真理的方法,用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标题中的话来说,它是“反方法的”(Feyerabend, 1975)。费耶阿本德主要将这种洞见应用于科学理论当中,他主张,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保持不受拘束、富于想象的状态,去构想现存的所谓知识体系的替代方案。^[11]但还有更令人不安的。即使在字面解释的情况中,对意指的意义的复原也被拒绝视为属于解释者的任务的任何部分。这方面的反传统先锋就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本书第三章的主题。德里达喜爱指出一些例子,其中由于存在着一些语义上的模糊不清,加上缺少告诉我们如何“掌握”所说内容的任何背景,其结果就是,我们根本无法指望有任何确定解释的话语。接着他又将这种洞见普遍化,推向整个文本和作品,他坚持认为,我们永远没有足够的权威,可以倾向一种解释而轻视另一种。他总结道,诠释学的雄心大业,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相反,所需要的是他所所谓的“散播”(dissemination)(他最近新书之一的标题用了这个词),即用越来越多的例子来揭示文本最终的不可解性(Derrida, 1981a)。

三

随着对按照自然科学的传统形象来塑造诸社会学科的可能性的怀疑日益增长,近年来也提出了一系列道德上的异议,反对实证主义者构建一种社会科学的野心。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看来就是“意识形态终结论”。麦金泰尔(MacIntyre)和其他人很快指出,这个论题本身最后不过是对共识政治的意识形态化读解,其中沉默被(鲁莽地,结果就是如此)默认为赞同(MacIntyre, 1971:3—11)。哈贝马斯随后继续强调,这种政治生活视角促生了更深层次的道德破产。如其《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一书所论,如果宣称政治不过是纯粹技术的事务,由此意识形态也必然走向终结,其结果就是,把国家的稳定甚至合法性都建基于它维持高水平技术成就的能力上,特别是提供持久经济增长率的能力上。其危险很明显:在经济衰退的年代,这些国家就没有能力要求他们的公民成员表现出一点更广更多的传统

忠诚,其结果就是,经济困难轻易而危险地演变成合法性危机(Habermas, 1975: 33—94)。令人惊奇的事实还有,尽管哈贝马斯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开出诊断的,但近来许多所谓的新右派政治作家,也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道德局限做出了惊人相似的抨击,他们维护的保守主义不是基于自由市场和最小国家,而是基于一种几乎是黑格尔式的想法:首先应该赞扬和培育的是社群、忠诚和顺从的价值观。^[12]

近年来心理学家对实证主义的规范性假设表达了甚至更加强烈的怀疑。莱恩(R.D.Laing)及其同事们就特别提出了这样的抗议,即如果用类似法律的、因果关系的术语来理解人类行为,那就意味着,一旦遇到非正常行为,就必然总是要问:有什么地方运转不良,从而引起了这种结果。但这样做就忽略了下述可能性:所讨论的行为可能是一种策略,一种努力应付世界的方式。莱恩论道,这种疏漏导致的结果就是将所涉行为人贬低为操控对象,而他们却应该被看作有意识的主体来对待。^[13]

在这场走向存在主义心理学的运动背后,可以辨认出萨特的权威。莱恩及其追随者在思想上明显借用了萨特。不过,在开始用这些术语来思考的更近的理论家中,最有影响的毫无疑问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本书第四章论述的主题就是他。直到他于1984年悲剧性地早逝以前,在过去的20年里,福柯一直致力于编著一些历史的案例研究,考察如何处理我们社会中的癫狂、性以及犯罪等诸如此类的主题。他的目的是要阐明,理解这类现象的呼声已经日益与社会控制技术相结合。作为哲学家,福柯关心的焦点逐渐发展为在对知识的这类呼声和强制力量的使用之间锻造出一种关联。作为道德学家,他的目标是敦促我们逃脱我们自己以科学专家的名义,在我们周围日益高筑的牢狱。他的抗议几乎是浪漫主义的(这在工业资本主义批判者中有着长长的谱系),他抗议我们社会的陈规旧律,而且还带着这样的召唤:用我们自己的人性的名义,来抵制和毁灭所谓的人的科学。

特别针对此种社会科学观念的这些不同路向的抨击,部分源自日益增生的疑问,即这些科学本身是否能够名副其实地符合它们自己的形象,即作为对知识的理性追求的范例。在这方面,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论述的怀疑主义最有影响。本书第五章讨论了他的著作。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引证科学史上的大量证据,证明科学团体几乎从未赞成某种波普尔的理想模型,去找寻既定假设的反例,并且仅仅接受能够通过此项测试的命题作为知识。相反,如库恩所称的规范科学的进程所寻求的

是对既定理论的确证,而这些理论的权威一般说来诉诸对那些尴尬的反例的处置,而不是由于反例的存在而弃之如履。对于理性信念的休谟式分析,波普尔要做的是去质问,而库恩恰恰是要恢复。^[14]此外,库恩还补充道,如果我们希望解释我们对某一特别科学假设的接受或拒绝,我们需要诉诸的是科学事业的既定惯例,而不仅仅是公正无私的科学家所谓的理性方法。饶有兴趣的是,福柯也有类似的思想,科学实践在他那里被刻画成一种控制手段,确定什么才能被承认为知识。

库恩最基本的论点是,科学不会、也不能效法波普尔的观念从事实践活动,其原因在于,我们赖以检验我们信念的是各种事实,而我们进入事实的路径总是经过过滤的,而从事过滤功能的就是库恩所称的我们已有的“范式”,或者理解框架(Kuhn, 1970:43—51)。说得更明白一点,本来就没有任何事实独立于我们用来解释它们的理论,因而对世界的考察、分类和解释也就不存在某种所有理性人都必须接受的途径。相互竞争的理论当然可以一较短长,但并非对照着某种客观的尺度:最终它们是不可简单比较的,结果是他们的拥护者可能被认为是(在库恩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隐喻里)生活和工作在不同的世界之中(Kuhn, 1970:134—135)。

库恩对科学理性的流行意见的攻击,与奎因(Quine)对他所谓的认识论教条的挞伐有些相似之处。该教条假定,在概念和事实之间存在着范畴上的区别(Quine, 1953:20—46)。这也令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主张,即我们要理解我们所谓的事实的所有企图,总是与一种特殊生活形式的构成有所关联。所有这些影响汇聚在一起,例如汇聚在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名著《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中,结果无非就是这样一种处境,即追问哲学以及诸种科学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的位置何在。如果我们通向现实的路径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们对什么算作知识的局部信念的支配,那么认为科学对世界本来面貌的发现将会越来越多的传统主张,就变得成问题了,或者至少是过度简化了。而且,如果不存在任何概念网格,让我们借以对世界进行分割和分类,那么哲学作为分析此类概念的学问的传统功能,同样也被置入疑问之中了。^[15]用康德的术语来说,认识论就是对能够明确认知的东西的研究,而这似乎也开始变成不可能的任务了;相反,我们却面临着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这个幽灵的威胁。^[16]

在那些沿此方向论证的学者中,历史研究越来越证明是灵感与证据的丰富源泉。福柯的著述坚持不懈地寻求把我们对世界需要如何看待的感觉,与关于在不同时代里它实际上是如何被看待的完全不同的记述形成对照。库恩与此相似,他也以历史学家的面目自居。他研究的是科学团体的实际行为,但他研究的方式是

通过考察历史记述,最终挖掉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些先验(*a priori*)承诺。部分由于这些发展的结果,许多历史学家,还有民族志学者,随后都明确地把他们的研究看作进一步的弹药,加入到反对天真的现实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关于人的本性与理性的规范观点的斗争上来。而在科学史家、道德哲学史家和政治哲学史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家那里,外国和异族的研究的关注点已经越来越多地从其他时代和其他文化的能力方面,转移到给我们提供我们最珍视的一些预想和信念的反例上来。^[17]

四

不过,我的考察到了这一步,谈论这些怀疑主义的思想脉络是对人文科学宏大理论回归的贡献,似乎显得自相矛盾了。如果说我挑选的所有这些思想家有什么共同特征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强调局部的和偶然的重要性的意愿,一种突出我们的概念和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的欲望,以及相应的,对所有那些无所不包的理论和单一解释方案的强烈厌恶——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甚至达到憎恨的地步。甚至,在我所提到的一些作家那里,这导致一种如此强烈的概念相对主义的形式,强烈到几欲自毁长城^[18]——这在福柯那里还只是暗示,在费耶阿本德那里就非常明确了,它还导致某种计划方案,意图摧毁以理论和方法组织经验材料的主张。把这种怀疑主义描画为宏大理论的确很危险,像是没有抓住要领。

然而,对这种矛盾也可以做出两种回答。第一种可以说是针对怀疑主义者本身的笑话。尽管他们已经给出拒斥理论创建活动的理由,但是,他们当然同时还是在从事理论创建活动。无可否认,福柯清楚表明了关于知识本性的一般观点,维特根斯坦向我们给出了关于意义和理解的抽象描述,费耶阿本德选择了一种几乎是波普尔式的科学假设判断方法,甚至当德里达告诉我们,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应当是对解释进行解构的时候,他也假定了解释构建的可能性。而且也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反理论家都在改变当代社会哲学家的努力方向上起了决定性影响,他们仅仅靠指出既定信念的不足就够了。简言之,给传统颠覆者留下功勋牌位并不存在矛盾:即使抛开他们本身不说,他们也已经通过广泛的社会学科证明是当前实践最伟大的理论家。

我的第二个也是主要的回答是,在考察了这些“全面颠覆者”^[19]所做的贡献之

后,我的故事还只是讲到一半。下面我们需要注意,在过去 20 年里,仍然存在着那种明目张胆的回归现象,有人精心构建的恰恰就是那些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的宏大理论,而这正是米尔斯及其同辈曾希望从人文科学的任何中心位置驱逐出去的东西。

这可以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案例中看得最为清楚。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怀疑主义者的解构工作恰恰为建构清理了场地,因为最伟大的理论构造正是由此拔地而起的。要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我们迄今一直考虑的大多数作家所极力强调的重点在哪里就够了。他们强调的是下述观念:概念并不是有着固定意义的永恒实体,而应该被看作武器(海德格尔的建议),或者是工具(维特根斯坦的术语),对概念的理解部分来说不过是看谁在挥舞着它们,挥舞的目的又是什么。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在起初援引的正统观念——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分析这些道德的语言或者政治的词汇——自然也就令人怀疑了。沿用福柯提出异议的方式来说,完全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毫无变化的概念和意义的网格,等着我们去做中性的分析。^[20]

这样,在分析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心就制造了一个真空。这个真空现在就由回归到这些学科的两大有来已久的目标填充了。其中一个重新升起的意愿,要求直接从事当今最为迫切的有待评价的问题。^[21]其结果是,像战争的正义、14 饥荒的社会原因、人对自然的责任、动物的福利、政治义务的局限、胎儿的权利、后代的权利,最重要的还有被“捍卫至死”的危险等话题,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明显迫切的类似问题,再次成为哲学争论的主题。^[22]但另一种甚至更令人惊愕的发展是以最传统、最系统的风格回到宏大理论。这种风格正是数世纪以前伟大的规范体系构建者采用的风格。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再也没有丝毫羞赧地告诉我们,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理解,怎样过我们的生活才是最好的。^[23]他们抛开自己的纯粹语言学的成见,继续去复兴一种顽固的、可以辨认的柏拉图主义的学术观点,这种学术主要关注的是阐明好的生活的特征以及自由正义的社会的界限。的确,这让他们显得如此严肃,以至于出现这样的迹象,通常说来,与伦理形而上学时代的主题比起来,人们本可以指控其琐碎平凡,但现在也许被另外一种相当合理的指责代替了,指责的是其过度的简洁和自满。^[24]

当然,真实的情况是,这样高傲的抱负从未被彻底拒斥,至少在德国社会哲学中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也一样。我们马上会想起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名字。^[25]不过,他们类似的信念现在